

Nordic Folkloristics



北欧民间文化 研究 (1972—2010)

王杰文 编著

學苑出版社

教育部留学人员归国项目

“人类学电影中的权力关系、伦理道德与本土想象 (JLJ1101)” 课题

北欧民间文化研究

(1972—2010)

王杰文 编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欧民间文化研究 (1972—2010) / 王杰文编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077 - 4070 - 7

I. ①北… II. ①王… III. ①民间文化—研究—北欧
IV. ①K53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3346 号

责任编辑: 许 力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尺寸: 710 × 1000 1/16 开本

印 张: 2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自序

民俗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自民俗学学科建立之初,国际民俗学界的交流就从未间断过。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俗学家们就翻译、介绍了一批外国民俗学名著。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民俗学正是在国际民俗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与发展的。1998年,钟敬文先生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构想,介绍了中国民俗学在21世纪亟待进行的几项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外民俗学研究的历史及其民俗学理论的翻译与介绍。

目前,对于欧美民俗学研究史方面的著作而言,最为中国民俗学家们所熟悉的是:吉赛普·科奇拉的《欧洲民俗学史》,因格·M.波伯格的《民俗研究的历史》,达格·斯托巴克的《北欧主要的民俗学家》,保罗·德·卡瓦赫-尼吐的《伊比利亚美洲民俗的历史:印欧混血种人的文化》,尤尔科·华他拉的《芬兰民俗研究:1828—1918》,理查德·M.道森的《英国民俗学家:一部历史》,露西·芬尼根的《非洲口头文学》,米歇尔·赫兹菲尔德的《我们曾经辉煌:民俗、意识形态与希腊的形成》,洪长泰的《到民间去》,露丝玛丽·利维·祖姆瓦耳特的《美国民俗研究:歧义的对话》,西蒙·J.布鲁恩的《美国民俗研究:一部知识的历史》,威廉·M.克莱蒙的《美国民俗研究一百年:一部概念的历史》,詹姆斯·R.道尔的《一个学科的纳粹化:第三帝国的民俗》,利克斯菲尔德·汉恩杰斯特的《民俗与法西斯:研究德国民俗的机构》,瑞杰娜·本迪克斯的《寻找本真:民俗研究的形式》,威廉姆·A.威尔森的《现代芬兰的民俗与民族主义》等。除此而外,散见于欧美民俗学重要期刊当中的有关民俗学研究史的单篇论文至少有200多篇,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历史文献基本上不为中国民俗学的学生们所熟悉。

作为一名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欧美民俗学理论与历史的时候,

我对自己无法系统地掌握相关知识的问题深感不满。由于不了解欧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总体历史,对于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分析问题的角度以及最终提供的理论只能是一知半解的,在借鉴他们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民俗现象时,生搬硬套的问题十分严重。这一问题的主要症结就在于没有系统地了解国际同行的“学术谱系”与“问题意识”。

2008年,我意外地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全额资助,有机会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系访学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为自己设定了两项基本任务:一是搜集欧美民俗学研究史方面的论文与专著;二是搜集有关“艺术表演”与“文化表演”的相关文献。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因为“表演理论”就是当代欧美民俗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不过,我所关注的“表演理论”的范围要大于“口头艺术的表演”的概念。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满足了我的愿望。在这里,我搜集并阅读了一部分有关欧美民俗学研究史的论文与专著,尤其是看到了《北欧民俗学研究通讯》(NIF News)、《寓言》(Fabula)、《民俗学研究者网络》(FFN)、《民俗学研究者通讯》(FFC)、《国际民间叙事研究通讯》(ISFNR)、《北欧民俗学年鉴》(ARV)、《芬兰文学协会集刊》(SKS)和《比较宗教研究》(Temenos)等详细记录了北欧民俗学近40年来发展历程的材料。在翻阅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我做了较为详细的读书笔记,这就是本书材料的来源。

准确地说,本书是一部“译介”与“述评”性质的著作,是对1972年至2010年之间北欧民俗学界“大事记”的介绍。(本书分年度介绍,行文中的时间表述均以被介绍年度为出发点)在这些貌似散乱的“大事记”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近40年来北欧民俗学连贯的“学术谱系”与“问题意识”,其中反映了北欧乃至国际民俗学界的困境、挑战、机遇与愿景。因此,本书虽然只能提供一些信息材料,但是,它也许可以帮助像我一样在学习民俗学的过程当中充满困惑的同学也未可知。

书名之所以是《北欧民间文化研究》而非《北欧民俗学研究》,原因有三:

一、在北欧诸国,“民俗学”的概念所指不同,而“民间文化研究”这一概念的涵盖性更加宽广一些。

二、近40年里,北欧诸国的民俗学研究正在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迈进,“民间文化研究”的概念可以揭示国际民俗学研究在新世纪的研究

趋势。

三、在中国学术界,人们对“民俗学”这一学科的理解千差万别,产生了许多误会。为了便于传播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本书决定取用“民间文化研究”的概念。

借鉴国际民俗学研究的经验是为了反思中国民俗学的历史,解决中国民俗学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更好地推进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国际民俗学界提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他们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独立自主的思考意识、解决问题的独特思路尤其值得中国民俗学的学生们认真学习。

是为序。

2012年6月

目 录

引 言 从劳里·航柯主持北欧民俗学协会谈起	(1)
第一章 北欧民俗学研究的新取向(1972—1981)	(3)
一、北欧民俗学协会的新定位(1972年)	(3)
二、北欧民俗学协会的几项成果(1973年)	(6)
三、北欧民俗学传统的延续与来自新大陆的新气息(1974年)	(14)
四、欧洲民俗学的核心议题(1975年)	(19)
五、北欧民俗学学科体系的建构(1976年)	(25)
六、民众诗歌与民间医药的研究成果(1977年)	(34)
七、“交流”成为北欧民俗学的关键词(1978年)	(41)
八、北欧诸国的民俗及其民族国家的建构(1979年)	(49)
九、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与历史人类学(1980年)	(64)
十、传统研究的研究传统(1981年)	(79)
第二章 保护民俗(1982—1990)	(95)
一、叙述、认同与类型(1982年)	(98)
二、北欧民俗研究的新路径、新起点与新任务(1983年)	(104)
三、寻找民俗的意义(1984年)	(117)
四、《卡列瓦拉》研究150周年(1985年)	(129)
五、中芬三江联合考察(1986年)	(137)
六、“民俗保护”的国际协作与规划(1987年)	(138)
七、民俗与社会现实(1988年)	(146)
八、“民俗保护”意见的最终文本(1989年)	(151)
九、北欧民俗学协会的生存危机(1990年)	(168)

第三章 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1991—2010)	(174)
一、民俗过程:第1届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1991年)	(175)
二、民间叙事与世界观(1992年)	(189)
三、民俗过程中的传统与革新:第2届民俗学者的 暑期培训(1993年)	(200)
四、时间与空间中的界限(1994年)	(214)
五、传统与冲突的认同:第3届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1995年) ..	(220)
六、北欧民俗学协会走向终结(1996年)	(234)
七、传统、地方性与多元文化的进程:第4届民俗学者的 暑期培训(1997年)	(245)
八、认知与思维:北欧民俗学研究的新方向(1998年)	(257)
九、口头传统中的变异与文本化:第5届民俗学者的 暑期培训(1999年)	(264)
十、回到“文本”:千禧年的民俗学反思(2000年)	(273)
十一、爱沙尼亚民俗研究的崛起(2001年)	(281)
十二、记忆、回忆与创造性:第6届民俗学者的 暑期培训(2002—2003)	(284)
十三、历史与实践:当代民俗研究的多面性(2004年)	(294)
十四、民间叙事的理论与当代实践(2005年)	(295)
十五、全球化与传统的更新(2006年)	(297)
十六、口头诗歌与田野作业:第7届民俗学者的 暑期培训(2007年)	(300)
十七、表征与传播:口头传统的文本化(2008年)	(305)
十八、不同的研究历史:国际民俗学的多元化走向(2009年)	(308)
十九、“新民俗学”之后:第8届民俗学者的 暑期培训(2010年)	(316)
结 语 “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	(321)
译名对照表(人名、机构和组织名、期刊名)	(323)
参考书目	(337)
后 记	(343)

引言

从劳里·航柯主持北欧民俗学协会谈起

北欧民俗学协会(Nordic Institute of Folklore)成立于1959年,最初是由丹麦、挪威、瑞典与芬兰四国的民俗学家创立的,目的是推动上述诸国的民俗学研究,并向国外的同仁与研究机构宣传北欧民俗学资料搜集的状况,汇报民俗学研究的成果。

北欧民俗学协会强调要研究上述诸国内部以及其他国家内部北欧人群体的“散文传统”(prose traditions)。事实上,这一研究机构不仅传播了北欧这一地域范围内的民俗学研究的信息,而且组织发起了北欧各国之间的联合调查项目,协调了北欧所有民俗学研究机构的工作,规划了北欧民俗学在教育、研究、出版与研讨等方面的活动计划,还负责接待国外访问学者,协调对外学术交流活动。这一机构还拥有自己的档案馆与图书馆。总之,北欧民俗学协会的基本任务是推进前沿性的学术研究,兼顾民俗学的教育问题。

北欧民俗学协会委员会每3年选举一次,委员会成员由北欧各国的政府任命。各国政府首先要广泛咨询各自大学及研究机构专业人士的意见,然后从中选拔、任命专家学者代表各自国家出任北欧民俗学协会委员的职务。在北欧民俗学协会委员会的13名成员当中,丹麦、挪威与芬兰各有3个名额,瑞典有4个名额。(自1975年起,爱尔兰成为北欧民俗学协会的全职成员之一,有1个列席会议的观察员名额。冰岛也成为积极参与者,并拥有1个委员会成员名额)每个成员国各选出1名代表组成北欧民俗学协会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共有4名成员,北欧民俗学协会的“主任”

在4名执行委员当中产生。

原则上,北欧民俗学协会必须设在具有民俗学研究机构的地方。从1959年至1972年,这一机构的总部就设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协会的主任分别是劳里斯·波德克(1959—1966)、布里纽夫·阿尔沃(1966—1968)和本格特·霍贝克(1968—1972)。1972年4月,协会所在地转移至芬兰土尔库大学民俗与比较宗教研究所,劳里·航柯先生成为协会主任。

北欧民俗学协会是在《北欧诸国文化合作的共识》之下开展工作的,这一“共识”是在1962年达成的,之后于1971年正式签署《北欧文化合作协议》,其目的是在北欧诸国之间,在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文化领域当中建立更加有效的合作关系,达到人力与物质资源的共享与充分利用。由此可见,北欧民俗学协会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性工作是在1972年之后才开始的,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先生主持了北欧民俗学协会的工作。

从1972年至1991年,劳里·航柯先生主持北欧民俗学协会,这20年时间正是北欧民俗学复兴的时期。从1991年至2002年,劳里·航柯先生从北欧民俗学协会离职以后,转而负责国际“民俗学者的暑期培训”(Folklore Fellows' Summer School)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同一时期,北欧民俗学协会走向衰落,并最终于1997年4月30日正式解体。北欧民俗学研究的地域性合作关系结束了,但是,北欧民俗学家同时形成了新型的国际性合作关系。

2002年,劳里·航柯先生与世长辞,他的继任者安娜-丽娜·西卡拉教授和她的北欧民俗学同事们仍然在他开拓的研究道路上努力前行。

第一章

北欧民俗学研究的新取向 (1972—1981)

在劳里·航柯先生主持北欧民俗学协会(NIF)的第一阶段,北欧民俗学家们的工作重心是回顾、梳理各自国家民俗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民俗术语词典项目、民俗类型书目项目、传统生态学项目(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诗的传统与传统的交流)是北欧民俗学协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北欧民俗学协会的新定位(1972年)

1. 北欧民俗学协会的工作内容

自劳里·航柯先生主持工作之后,北欧民俗学协会重申了协会的目标与定位,强调北欧民俗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口头传统与散文叙事”,认为散文传统与其他民俗类型不同,它们是一些活生生的、不断扩展与延伸的口头交流的一部分。口头传统的搜集与研究在北欧诸国民俗学研究当中传统久远,对相邻学科,比如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与比较宗教学等等,具有重要的跨学科的价值,当然,这些学科的学者们对被记忆的传统与口头交流也同样具有研究的兴趣。

北欧民俗学协会重申:出版工作、档案整理与图书管理工作、各种层次会议的举办、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研究项目的资助等都是协会日常工作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北欧民俗学协会的资助计划每一次只资助一个研究项目,而且必须在前一个研究项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下一个资助计划才开始

酝酿。1972年,一项关于民俗术语的项目正在紧张的研究进程中,研究者们计划编纂一部民俗术语词典^①,以方便北欧乃至国际民俗学家的使用。该书计划于1974年在赫尔辛基举办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大会(ISFNR)^②之前出版。而一项关于“类型”的研究计划也已经启动,旨在为大学与相关研究机构提供关于传统类型的基本参考体系。被选中研究的第一种类型是民间故事,北欧诸国对民间故事的研究可谓传统久远并具有很高的水平。这一研究项目的目标是对北欧诸国的民间故事进行一次普查。研究团队将由六人组成。另外,北欧民俗学协会认为,如果申请资助的项目仅对某一个北欧国家来说是重要的,它将不会被资助。

2. 北欧民俗学协会为谁而设

从传统上说,民俗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比较”的研究方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北欧民俗学协会认为,国际民俗学者、不同国家民俗学科研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民俗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民俗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搜集本民族的民俗材料,以便于国际同行的使用。目前,国际民俗学的研究方向正在不断向外拓展,国际民俗学界需要加强学习与交流,需要了解国际民俗学研究领域不同学派与不同分支的方法论、研究的目的、通用的术语、研究的前沿与正在进行当中的研究项目。北欧民俗学协会的民俗学研究具有这种国际性学术视野,这源于北欧诸国文化的类似性以及共同的学术传统。

第二,北欧民俗学协会将以简报的形式传播国际民俗学研究的最新消息,使散乱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民俗学研究信息普遍而迅速地传播开来。

第三,北欧民俗学协会也可能使关心与研究北欧文化合作的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们受益。跨学科的合作是学术研究的趋势所在,民俗学与其他关注文化、社会与传统的领域密切相关,民俗学本身正在对自身的目标与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目前,民俗学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及时通报自身的研究趋势。北欧民俗学协会可以向相关学科与政府部门

^① 《北欧民俗术语词典》的编辑工作是由劳里·航柯先生主持的,词典的体例是:术语在学科史当中的背景介绍+术语的定义+例子+术语的民俗学应用+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② 1969年8月31日,第5届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大会在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召开,大会决定第6届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大会将于1974年6月16日至21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

说明自身研究方法与材料的重要性。

3. 北欧民俗学协会的现状

1972年,北欧民俗学协会会员国的民俗学家们对于邻国同行们的民俗学研究状况并不十分熟悉。芬兰、挪威、丹麦三个国家的民俗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而瑞典的民俗学实际上类似于民族学。目前,从整体上看,北欧诸国民俗学的研究具有两种趋势,一是研究当下的传统与大众的知识,一是关注文化人类学的问题,即运用一种古典的研究方法研究传统的类型。

也是在1972年,北欧民俗学协会提议要联合编辑出版统一的民俗学课程表与教学目标,编辑标准的民俗学词典,以便在北欧范围内开展民俗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目前,在整个北欧范围内还缺乏统一的民俗学教科书。北欧民俗学协会的民俗学家们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出版介绍民俗“类型”的民俗学概论;另一种是出版民俗学经典论文选集,并配以简要的评论。鉴于国情的差异,北欧民俗学协会首先要求北欧各大学提供各自民俗学相关课程的目录与参考书目,试图从中精选一部分内容出版选集,然后再分配到各大学去使用。

为此,在随后几年里,北欧民俗学协会计划组织北欧民俗学家对北欧固有的民俗类型进行普查。目前进展良好并准备出版的是关于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成果。目前大家一致同意对于散文传统(传说、符咒、微型类型、谜语、儿童传统、民间信仰与微型文学)进行全国性的普查。除了上述类型之外,其他类型也在普查之列。但是,大家一致认为民间故事类型的普查工作最为重要。

4. 北欧民俗学协会的档案工作

两百年间,北欧诸国的民间组织及个人搜集整理了大量民俗材料,其搜集与整理的方法与材料的类型因搜集者的兴趣与学识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这些材料被保存在个人的或者公共的档案馆里。不同的收藏者又使用了不同的分类技术,这为使用者带来诸多不便。自1968年始,北欧民俗学协会开始对民俗搜集物进行调查,重点对北欧86个民俗学研究机构与档案馆的藏品进行描述,详细地介绍它们的组织模式、工作方法、档案收藏的

数量与质量、分类体系、目录格式、出版工作以及为民俗研究提供的服务。其中,丹麦民俗学家本格特·霍贝克等编辑的《北欧民俗与民间音乐——北欧民俗学协会原始材料目录》(1972,NIF,NO.1)就是这一调查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二、北欧民俗学协会的几项成果(1973年)

1. 关于“儿童游戏”的研究成果

儿童的游戏向来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初,北欧民俗学的研究趋势转向了城市化进程中儿童文化的整体。研究的方法是共时性的,即关注目前北欧的儿童社会,那是一种活生生的儿童亚文化,而不再是被当作古代文化的最后遗存。新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新的搜集材料的方法与新的参考性术语,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法被民俗学家改造之后加以应用。儿童传统的旧有的分类方法受到了挑战,因为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类型被包括进来了。目前北欧民俗学家们发现,传统的与非传统的、民众的知识与书本的知识之间并非壁垒森严,而是高度流动的、相互转化的。

1971年6月17日至20日,北欧12名民俗学家聚集在瑞典讨论儿童民俗的研究。赫尔辛基大学的丽阿·沃塔妮教授与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儿童传统与大众传媒,一个儿童及其传统,环境与性别的作用,儿童民俗与社会的、物理的环境,儿童传统的功能,在儿童与青年人之间的年龄群体。

与会的民俗学家们一致肯定了儿童传统的实在性,但对于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多数人坚信大众传媒会破坏儿童的传统。专家们认为:儿童传统的“起源”与“实在性”之间不再相关。所有传统,包括大众的知识与书本的知识,都让研究工作者深感兴趣,因为它们构成了被研究群体活态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北欧的民俗学家们已经不再主观地坚持把“传统”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关注民众的活态生活去了。注意到这一点,北欧民俗学在20年之后转向“文化研究”就不难理解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大众传媒影响下而产生的新游戏,由于存在的时间较短,在儿童传统中的位置还比不上口头习得的

儿童游戏重要。

对于“一个儿童及其传统”的个案研究,与会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一些专家认为,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另一些专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有趣的也是有用的。对于“一个儿童及其传统”的研究需要同时应用“观察法”与“访谈法”两种研究手段。研究者们也认识到,调查者的在场会对儿童及其伙伴的行为产生影响。这当然是田野作业方法论的老问题了,北欧的民俗学家们早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

专家们普遍认为,儿童传统中的一部分是专属于儿童自己的,是独立于成人的控制之外的,这些基本上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畴;儿童传统的情境因他们生活的区域不同而变化,多变而丰富的儿童文化似乎产生于古老的区域,那里有各个年龄段的儿童群体;区域的特征也影响着男女之间的关系,非常普遍的是,在那些只有少数9至11岁男孩与女孩的地域,所有孩子们会在一起玩耍。而在大型的居住区域,如果儿童的数量超过了20个或者数量更多,男孩女孩们倾向于形成各自的性别群体。

儿童传统的功能,一方面与成人的传统一样,另一方面又有特殊的年龄需要。心理学家认为,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与不同的兴趣点,这一论断当然很重要。不过,不同的年龄群体又有不同的传统,这与不同的生活环境相关。儿童传统的功能至少有以下四种,这些功能可能是平行的或者是重叠的:一是寻找自尊的功能(谁能讲最好的笑话,谁知道最近的谣言,谁能做最好的游戏等等);二是强化群体间的联系的功能(目的是对抗其他儿童与成年人);三是娱乐的功能,努力寻找快乐与刺激;四是便利化行为的功能,即传统有助于个体的选择,使个体更易于进行群体内的交流。功能可以更多,但是重要的是如何量化这些功能,而不是仅仅看到它具备这些功能。

2. 北欧民俗学协会与计算机化

早在1968年,预感到计算机可能会带给民俗学研究的巨大推动力,北欧民俗学协会就提出了民俗材料“计算机化”的设想,但是,对于这一设想,北欧民俗学家们一直没有获得一致的看法。唯一进行过的尝试是对丹麦谚语的“计算机化”研究,这是北欧民俗学协会与北欧大学计算中心的合作项目。北欧民俗学协会于1969年8月为这一研究

成果举办了研讨会,丹麦因此开设了 EDP(电子数据处理)课程并于 1970 年夏天举办了培训班,来自北欧民俗学协会 4 个成员国的 18 位档案馆人员接受了培训。

1973 年,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数据化讨论会有 20 人参加,会议围绕三个议题展开:

(1)数据化进程与档案化技术。计划以芬兰文学协会民俗学档案馆收藏的民间诗歌材料为基础,对其目录体系进行描述。

(2)文化的地图:传统—生态学的分析与计算机的分析。描述了在编辑芬兰文化地图的过程中的数据化技术。

(3)对文本及其内容的数据化分析。这一部分介绍的是语言学的统计性划分以及丹麦学者对于谚语的数据化分析。

劳里·航柯先生认为,北欧民俗学家需要这种数据进程化的培训,并决定与北欧大学计算中心合作。培训课程的教益是:如果一位民俗学家想要应用计算机来处理自己的材料,他必须找到两位熟悉人文主义本质问题的程序师与他合作。被输入计算机的材料必须是准确无误的,因为所获得的结果的准确性依赖于计算机所接受的信息的形式结构,人文主义者并不需要亲自为自己的材料编程,但他必须训练自己学会以形式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

3. 清理遗产的行为

1970 年 6 月 27 日,北欧民俗学协会为纪念尤尔科·华他拉而召开研讨会。尤尔科·华他拉是举世闻名的芬兰民俗学家,他在民俗学史与理论民俗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芬兰民俗学史的描述奠定了芬兰民俗学研究的基础。

会议出版论文集《传记:过去的民俗学家——纪念尤尔科·华他拉论文集》,本格特·霍贝克在这本书的前言中问道:“在一本书中介绍北欧的重要民俗学家合适吗?”“北欧民俗学具有自身的特征吗?”显然,霍贝克并不认为一本书可以完全概括所有理论家与理论成果。但是,在该书中,24 位目前活跃在北欧诸国民俗学界的民俗学家评述了 26 位具有代表性的北欧民俗学先驱人物,这些先驱人物的影响力目前仍然十分明显,其中包括 7 位芬兰民俗学家、6 位瑞典民俗学家、5 位丹麦民俗学家、6 位挪威民俗学

家以及法罗群岛与冰岛民俗学家各 1 位。这里包括了北欧第一代与第二代民俗学家。第一代民俗学家主要生活在 19 世纪,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欧洲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兴盛的时期。他们继承了赫尔德与格林兄弟的衣钵,搜集出版了大量民间歌谣与故事,最终扩展到对整个北欧范围内民众传统进行搜集整理。第二代民俗学家则组织了民俗学研究机构,发展了民俗学学术体系。他们具有更加明确的科学目标。与老一代民俗学家相比,他们更加具有创新的精神。他们质疑搜集民俗的方法与技术,从而使民俗学从简单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转向了深入的分析与解释工作。他们的青年时代经历了 19 世纪的最后一个 10 年,但他们主要生活在 20 世纪初叶。R. R. 马雷特、爱德华·B. 泰勒、安德留·兰、詹姆斯·G. 弗雷泽的著作被他们反复地引述,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学术权威,而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也偶尔被他们引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北欧诸国的民俗学研究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样的思想观点与相同学者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北欧各国的民俗学领域,在同一时期内,搜集、研究与出版沿着相似的道路在北欧诸国进行。这些北欧的民俗学家们还相互熟悉,史文德·古鲁克维格所提出的歌谣研究方法就与 20 年后“地理—历史学派”(geographical-historical school)应用于《卡列瓦拉》(Kalevala)诗歌研究的方法近似。史文德·古鲁克维格、阿克赛尔·奥里克提出的研究方法,即使没有卡尔·科隆的大力发展,也是影响深远的。

北欧的民俗学与比较宗教学是相互交叉的,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从业人员。其中尤尔科·华他拉与马丁·皮森·尼尔森无疑是最杰出的研究者。在过去的民俗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感兴趣于“人以及他们的文化”,而不是感兴趣于“民俗”才从事研究工作的。

19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往往被称为“书斋学者”,令人奇怪的是,在北欧第二代民俗学家当中,几乎所有人都非常熟悉活生生的民俗传统。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工作还受到了他们年轻时期田野考察的影响,但是当时顶级的民俗学家并不是田野工作者,相反,整体的理论以及对于一种已经消失的民俗形式的细致考察占了上风。正是由于这种风气,19 世纪的民间文化本身受到了轻视。随着研究兴趣的转换,民俗学家们开始注意描述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当时的民俗学家们有意识地搜集这一方面的材料,并试图给予所观察到的民俗事项以客观的描述,但是这样的学者通常不为当